

星火点点 刻梓以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红色雕版印刷业考论

孙 云 霄

内容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遭敌人重重封锁,导致铅印、石印等机器印刷设备与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群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及学校的课本供应。于是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出版社、社会团体、民间书坊、合作社和学校等机构,选择利用雕版印刷开展出版事业。所刻红色书籍中,以识字教材和初级国语、常识课本为主,版式疏朗,内容贴近农村实际。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在华中、华东、华北、西南和西北等多处根据地发挥作用,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工作和教育事业,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根据地 红色出版 雕版印刷 革命文献

引言

光绪以后,在技术、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机器印刷业(如铅印、石印)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崛起^①。但在偏僻村镇和中西部地区,由于交通落后和社会动荡等原因,机器印刷的发展较为缓慢,当地的刻书业虽然受到冲击,但仍保留了相当的市场份额。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从土地

* 本文系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雕版印刷业与书籍文化研究”(SDCX-RS-202500023)阶段性成果。

①详参[美]芮哲非著,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292—295 页。

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地的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遭敌人重重封锁,缺乏铅印、石印的设备,油印所需耗材也较为紧缺。因此,各级党政机关积极利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术,除直接领导的出版社、印刷厂和抗日团体外,还兴办农村合作社,并引导民间书坊刊刻红色读物,有效缓解了书荒问题。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民国时期雕版印刷业严重衰落,所以相关研究较少,且没有涉及红色政权^①。有关根据地出版业的研究,则很少关注雕版印刷,有学者甚至认为边区印刷事业“基本上抛弃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②。有的论著虽然提到几部雕版红色书籍^③,但并未展开探讨。仅有少数学者意识到雕版印刷对于红色出版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就提出“新善本”的概念,注意征集稀见的进步书刊和革命文献^④。他谈到革命根据地的印刷事业时曾指出:“最初利用粗糙的土纸,窳劣的印刷术,甚至利用雕版技术,印行了许多对革命有重大作用和贡献的书刊。”^⑤再如严帆指出:“中央苏区时期,古老的雕版印刷、石印平版印刷为新闻出版印刷发

①如刘洪权《民国雕版刻书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4期,第51—56页)、李晓源《浅议民国刻本》(《河南图书馆学刊》2014年第8期,第135—137页)、孟宪钧《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结束篇》(《收藏家》1998年第6期,第42—45页)、胡培培《中国雕版印刷业的夕阳晚照——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雕版印书探析》(《出版科学》2022年第2期,第119—125页)、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秦嘉杭《新中国雕版印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等论著皆未涉及雕版印刷的革命文献。

②赵坤:《流动的古登堡:边区印刷事业研究(1927—1948)》,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王洪喆指导),2011年,第51页。

③如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93页)、范慕韩《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吴洪成等《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444页)等论著提到个别几种雕版红色书籍。

④详参冯宝琳:《回忆五十年代创建新善本手稿特藏库的经过》,《图书馆学通讯》1982年第3期,第52—55页;赵洁敏、黄霞:《北京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的过去与未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4期,第9—10页。

⑤赵万里:《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4期,第19页。

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①孙玉祥总结抗战时期山西出版的特点之一为：“没有这些条件（引者注：铅印、石印），就木版刻印（如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蜡版油印。”^②邱锋通过考察《工农兵三字经》的版本，认识到：“在简陋的条件下，用油印、木刻、石印翻刻这些革命课本。”^③李频在研究韬奋书店所刻《绘图新三字经》时指出：“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使出版者选择了古老的木刻雕版印刷。”^④然而，他们只是就某一时段、某一区域或者某本书使用雕版印刷的情况进行简单论述，没有展开全面调查和系统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从发展趋势、地理分布、形成原因、刊刻机构和书籍特征等方面，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雕版印刷业，发掘其在革命出版事业中起到的作用，探索研究红色文化传播机制的新路径。

一、发展趋势及地理分布

笔者据版本实物和文献资料，统计到雕版印刷红色书籍 59 种、版本 94 种^⑤（见文末附表 1），而其实际数量应远大于此。红色刻本之所以流传较稀，一是因为刻书活动多在偏僻落后地区进行，加之日寇扫荡和国民党查禁，保存环境恶劣。比如抗战时鲁西北文救会曾刊刻多种红色读物，“可惜这些木刻版和印出的书籍在战争年代都失散了”^⑥。二是雕版书籍多为普及性教材，使用的纸墨又差，导致读者及藏家不够重视，容易散佚。此外，图书馆和博物馆对红色雕版印刷一事缺乏了解，著录革命文献的版

①严帆：《中央苏区报刊与书籍的印刷机构考述》，《中央苏区文艺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年，第 205 页。

②孙玉祥：《抗战中山西出版特点及其意义》，《三晋文化论丛》第 2 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202 页。

③邱锋：《土地革命时期〈工农兵三字经〉对孔孟〈三字经〉的否定和批判》，《文物：革命文物特刊》1975 年总第 3 号，第 45 页。

④李频：《〈绘图新三字经〉出版价值探微》，《印刷文化》2022 年第 1 期，第 69 页。

⑤各边区政府编纂的教科书种类繁多，且时有修订；各地翻印时，又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改编；有的书籍还缺少版权页，或者信息不完善。这就给版本鉴定、尤其是翻刻本的底本考察带来较大困难，所以笔者统计时暂不区别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次。

⑥丹彤：《鲁西北抗日文化教育工作片断》，本书编写组编：《光岳春秋（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89 页。

本情况时不够详细^①,数字影像化程度也很低。故仅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做如下分析。

(一)发展趋势

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曾雕版印刷红色书籍,其中可以确定年代的有 81 种(见图 1)。不同时期,刊刻书籍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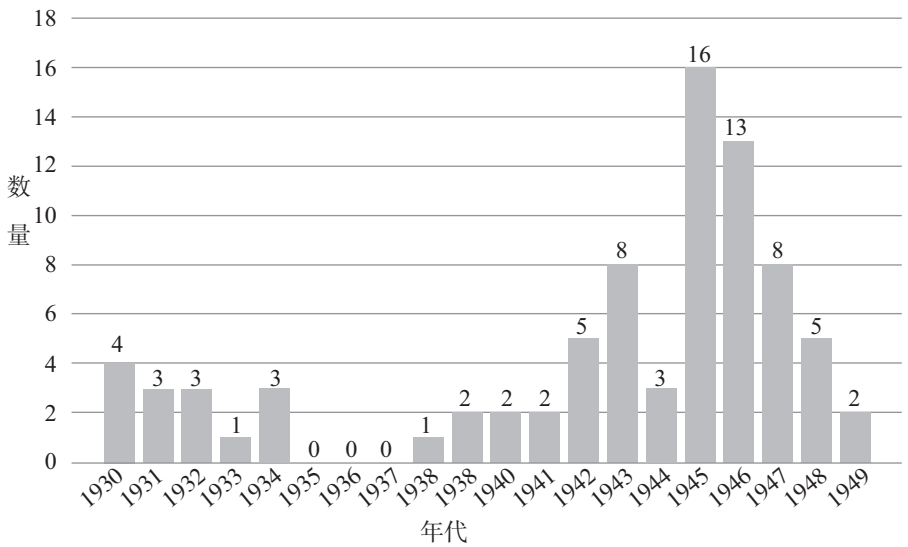


图 1 1930—1949 年革命根据地刊刻红色书籍的数量

①如 1987 年山东省图书馆编印《馆藏革命文献书目》、2001 年重庆图书馆编印《馆藏革命文献目录》、《首都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书目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上海图书馆藏革命文献总目》(中华书局,2021 年)和陈建龙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革命文献图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等书,只有少数条目标注油印或石印,其余默认为铅印本,无刻本。再如湖南省档案馆所编《湖南老区革命文化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影印了部分革命文献,却未标注各书版本;其中,《工农兵三字经》为刻本,《常识课本》《儿童文学》《红军读本》为木活字本。可见,仅凭现有书目,无法反映各馆馆藏红色刻本的真实状况。同时,《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年)、《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及《民国线装图书总目》(中华书局,2020 年)等书,也未著录红色刻本。至于国家图书馆线上数据库“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尚不能以版本项进行检索,且许多条目缺少版本项。目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北京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年)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编《红色出版物总目》(中华书局,2023 年)著录了十余种红色刻本。

根据地初创时,红色政权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苦苦挣扎,不得不将生存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彼时印刷工作服务于革命宣传,以标语、传单和报纸为主,尚未有足够精力投入平民教育和书籍出版。如1929年中共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宣传工作决议案·特别注意于一般群众中的宣传工作》^①,几乎没有提及图书发行。直到1930年古田会议后,各种教材和政治读物的出版才稍有起色^②。但此后的斗争形势一直不容乐观,且雕版印刷需要储藏刻板,不方便快速转移,所以较少使用。抗战初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根据地条件艰苦,而图书出版周期长、耗材多、发行隐蔽性差,“仅作为根据地出版物的点缀偶尔在小范围内完成”^③。

由图1可知,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雕版印刷的红色书籍最多,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根据地的抗战形势好转。1944年初,日军出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需要,对正面战场发动猛攻。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转入攻势,解放区迅速扩大。二是因为工作方针有所变化,“(延安)整风运动推动了教育改革,大生产运动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④。1943年后,学校和学生数量快速增长,群众教育和冬学运动也蓬勃发展^⑤,扫盲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刘松涛回忆华北根据地课本紧缺的情况:“不少地区,还只能做到两人一本,或三人一本,有的教师每天除了白天上课之外,夜里还要用很多时间在灯前给孩子们抄书,更有的由高年级学生给低年级学生抄书。”^⑥1944年底,中共中央召开文教大会,总结教育改革经验,确定以边区为单位统一编纂教材,“出版事业开始走向了大众化、通俗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新道路”^⑦。1949年,史育才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266—268页。

②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17—18页。

③齐峰、李雪枫:《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④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82页。

⑤详参周江平、刘素娜:《敌后教育与动员:抗日战争时期的冬学运动》,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57页。

⑥刘松涛:《华北抗日根据地用革命办法办学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1年第4卷第2期,第30页。

⑦齐武编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17页。

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报告称：“1943年后减租减息，群众生活改善……为了解决看书问题，自己集资去买书，进而办文化合作社，这种自发的现象，在群众发动后的各地都呈现着。”^①内战全面爆发之前，根据地的环境相对稳定，识字人群扩大，导致书籍供不应求，于是某些地区就利用雕版印刷解决燃眉之急。不过，这一时期根据地的机器印刷业也在快速发展。由于日本战败，物资统制和封锁禁运得以解除，国内印刷业和机械制造业恢复元气，解放区也可以通过地下渠道从国统区购买印刷设备。1947年后，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共控制的城镇增多，机器印刷产能得到大幅提升，相对低效的雕版印刷遂被逐渐淘汰。

（二）地理分布

据笔者统计，全国范围内的多个革命根据地都曾刊刻红色书籍。土地革命时期的刻书活动，主要分布于南方的中央苏区、湘鄂苏区、湘鄂赣苏区、赣东北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琼崖根据地。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包括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山东根据地、苏皖边区、浙南根据地、浙东行政公署。其中，晋冀鲁豫边区刊刻书籍的种类及数量最多。若以省份而论，雕版印刷红色书籍的现象广泛分布于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四川、海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见文末附表2），其中，山西、山东、河北名列前茅。这是因为三省根据地面积广大，群众基础良好，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最早，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山东、河北地处华北平原，人口稠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强调：“在目前交通运输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靠外面的图书来发展根据地的文化事业是不可能的。各根据地应当靠自己建立出版事业。”^②据统计，晋冀鲁豫边区编印的冬学课本数量首屈一指，比之次席晋察冀边区多出一倍有余^③。但拥有印刷机器的城镇大多控制在敌人手中，根据地铅印、石印的产能无法匹配宣传和教育的需要，故而对雕版的利用率较高。

①史育才：《华北区新华书店工作报告》，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

②《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共产党人》1941年第15期，第7页。

③郭艳红、李贝贝：《扫除“文盲”与“政治盲”：根据地解放区冬学课本的编印策略与内在逻辑》，《出版科学》2023年第5期，第121页。

(三)形成原因

1. 机器印刷设备紧缺

根据地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工业基础薄弱、交通条件简陋,加之敌人封锁、侵扰,导致机器印刷业发展缓慢,“无机器,技术人员很少,铅是从各地几斤几斤的搜集来的,纸张没有,1940 年报纸缺了,改用土纸(即麻纸),油墨没有,自己做,机器零件多是凑成的”^①。即使是延安的中央印刷厂,最开始“真正熟练的能排字和拼版的工人仅有二个,其他十几人都是刚从学生中提拔起来做排字的。就是以其他部门的熟练工人来说亦占少数”^②。印刷设备需从敌占区购买,技术人员也要到城市聘请,耗费大且风险高。尽管边区人民修旧利废,自制马兰纸、油墨、铸版机等,仍不能填补供给缺口。就算使用更简捷、更便宜的油印,也存在蜡纸不足等限制。如抗战时河北枣强根据地急需课本,“只有少数村能用蜡纸油印一点”^③。相比之下,雕版印刷的原料低廉易得,较少受外部环境制约。1939 年,李桦曾谈及木刻相较于机器印刷的优势:“只要有一把刀子,全不靠舶来的制版材料,无论在何时何地,战争将延长到什么时候,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到怎样的困难,都不至发生影响。”^④ 1940 年,陵县抗日政府粮秣科科长王工一印刷《合理负担表》,起初油印几十份,但因“敌人控制着城市,油墨很缺,不易买到”,最终改用雕版^⑤。同时,根据地军民一心,群众积极提供板材。如 1939 年华北新华日报社进驻武乡后,村民们主动把家里和山上的梨木、枣木送给报社的刻字工人^⑥。

2. 雕版印刷传播广泛

清代前期,西北地区的刻书业较为落后。如光绪五年(1879)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报称:“书肆既无刊印官书,即南省已刻之书又因道路艰险无人贩运到晋。”^⑦同光之际,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关中书院、新疆迪化等

①史育才:《华北区新华书店工作报告》,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 年)》,第 338 页。

②晓周:《边区的印刷工人》,《新华日报》1940 年 6 月 30 日,第 4 版。

③步进:《记枣强新时代书店》,《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1990 年第 7 辑,第 53 页。

④李桦:《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战时木刻?》,《救亡日报》1939 年 3 月 21 日,第 4 版。

⑤王工一:《粮食工作的回忆》,《陵县文史资料》1985 年第 1 辑,第 92—93 页。

⑥李绍君、郝雪廷:《武乡的红色驻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208 页。

⑦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集》第 1 册《奏疏·设立书局疏》,岳麓书社,2008 年,第 409 页。

地设局刻书^①。之后,陕西、山西、甘肃诸省兴办官书局^②,大大带动了当地的刻书业。以山西为例,后来刊刻过红色图书的区县(见文末附表2),在清末民初几乎均有刻书记载^③。考察北方红色文献的刊刻地,笔者发现,晋东南、鲁西和豫北地区较为集中(图④见封二),而晚清时,它们之间即存在较为密切的书籍、刻工及书业资本流动。如山东东昌府(聊城)的著名书坊书业德,自清代乾隆经营至民国,并在山西太原、祁县、平遥等地设有分号^⑤。清末曾在聊城张秋镇开画店的阎均振称,彼时源茂永、鲁兴聚和刘振升是当地最大的三家年画店,东家皆为山西陆安府(今长治、长子、潞城一带)人^⑥。再如河南沁阳的翰墨林书铺,是山西汾阳翰墨斋开设的分店^⑦。沁阳的书贩和刻工,也会前往晋东南开展经营活动^⑧。如1939年长治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编印《战时读本》,“石印印不过来,就在河南找了一些会刻字的工人,组成了一个木刻印刷组”^⑨。

①详参刘一巧:《左宗棠与近代西北图书的刊发》,《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5期,第84—87页。

②详参韦力:《寻访官书局》,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年,第77—134页。

③笔者从“孔夫子旧书网”找到多例,兹将各地刊刻年代最晚的版本胪列于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赵城南乡瓦窑头村刻《玉历钞传警世》,光绪三十一年阳城署刻《治白喉良方》,宣统二年(1910)沁源同善堂刻《修身要妙》,1914年稷山李德善刻《通鉴缙绅地里图》,1917年襄垣南铺村刻《保身良方》,1915年武乡彰化坛刻《觉迷金针》,1917年屯留西原村刻《改过积德》,1923年闻喜福寿堂刻《劝世真乐经》,1924年沁水侯宅永聚堂刻《姚秦三藏西天取清净解论》,1925年长治乐善堂刻《列女修行宝传》,1926年陵川平城镇明心堂刻《十嘱修真篇》,1935年潞城同善堂刻《灶王经》。

④图片来源于“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https://www.modernhistory.org.cn)发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分区详解地图》,本文截取了其中与刻书地点相关部分,并对刻书地做了突出显示。

⑤吴云弢:《聊城刻书与出版业的兴衰概况》,《山东出版志资料》1985年第2辑,第123页。

⑥李新华主编:《山东民间艺术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⑦梁世英、邓宏里:《怀庆府城的笔墨庄堂和印刷书社》,《沁阳县文史资料》1990年第3辑,第16页。

⑧高仁贵:《建国前潞城县商业市貌概观》,《潞城文史资料》1999年第7辑,第11页。

⑨杜毓沅、赵文敏:《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情况回忆》,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6页。

3. 刻工容易招募

清代中叶以后,随着刻书业的繁荣,刻工群体的规模愈加庞大,在书坊之外出现了大量的刻字店,以承刊承印为主^①。尽管刻字业与刻书业关系紧密,但二者的发展曲线并非完全一致。除书籍外,刻工还承接书契、简帖、笺纸、仿单等业务^②。因此,民国年间刻字业的生存空间要大于刻书业。另外,刻工也参与铅字的雕刻,最有名者,为1915年商务印书馆聘请武昌陶子麟创制“古体活字”,直刻铅坯^③。民国初年北京雕版工人大量失业,其中一部分便转行:“专在印刷局里刻那没有部位的铅字……倒比在刻字铺当工人还强。”^④同时,部分石刻工人兼擅雕版,而山西石刻繁盛,晋南尤多^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辈雕版艺人尚存于世,为当地刊刻红色读物提供了技术支撑。如1939年初,何云在山西沁县开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但铅字残缺不全,浇版房领班张建功就从长治聘请了刻字师傅宋亮珍及其学徒侯和尚^⑥。1939年冬,鲁艺木刻工作团计划采用年画的形式宣传革命,但对水印技术缺乏了解。他们从老乡口中得知庙里的灵签是雕版印的,于是寻着线索找到曾经做过刻工的赵四;又从《新华日报》社找到一位印过年画的王师傅,“教大家制印台,绑擦子,夹纸和粘套版”^⑦。再如聊城的刻工多为附近堂邑县人,冀鲁豫边区第三专署开办的印刷厂中,“书写、木刻师傅是从堂邑县赵吕庄请来

①详参郑幸:《清代刻工与版刻字体》,中华书局,2022年,第103—107页。

②详参钱永兴:《民间日用雕版印刷品图志》,广陵书社,2010年。

③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80页。

④《刻字工人底状况》,《民国日报》1920年5月26日,第2版。

⑤程章灿论曰:“石刻刻本与版刻刻本虽然材质不同,技术上却有相通之处,所以,有些能工巧匠就兼擅版刻和石刻。”(《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9页)另外,程章灿的《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和李贞光的《民国时期山西石刻刻工辑补》(《枣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72—79页)已统计出上百名民国时期山西的石刻刻工。

⑥张枫如:《对〈新华日报〉华北版与太行版的回忆》,太行新闻史学会编印:《太行新闻史料汇编》,1994年,第351页。

⑦彦涵:《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年画和木刻活动》,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第631页。

的”^①。1942年,鲁西北文教会也从此地招聘刻工^②。

此外,雕版技术上手较易,如光绪十六年(1890)长沙《刻字店重定条规》第17条曰:“新带徒弟,试手准一月为度。”^③且刻版工序主要分为发刀、挑刀和打空,打空较易,可派给新手操作。如1945年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编印《看图识字》,美术编辑赵力克“刻出图画的线条”,其他人“用刀子挖空白”^④。

4. 雕版印刷的特点契合初级教育的需求

民国时期普通百姓的识字率很低,倘若在农村开展文化工作,教材的内容需要通俗易懂、形式易于接受。如1929年底《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决议案》要求平民学校的教材:“要通俗,句子不可太长……课本上要有插画,使学生看图会意……第一册注意名词的编辑,全册约三十课,每课不能超过二十个字。”^⑤1939年姜存松曾探讨书籍形式的通俗问题,认为字体上“铅字不如‘活体’来得通俗,并且可使民众得到练习书法的机会”^⑥。所谓“活体”即软体字,如国图收藏的《妇女识字课本》(索书号:sc05701)和《革命对联大全》(索书号:sc05124)均为写刻本,版面舒朗。再如冀县书店翻刻《初级新课本》第6册,将原版的铅印小字改为大字^⑦。字大、图多、楷体等印刷要求,对于铅印和石印设备捉襟见肘的边区来说绝非易事。而用铁笔刻写蜡板的油印,笔划较细,观感上不如雕版;且印数较少,因蜡纸寿命的极限数为五百份^⑧。对雕版而

①朱惠然:《抗战时期的教育工作》,《血火春秋——冠县革命史料选编》,山东省出版总社聊城分社,1988年,第393页。

②丹彤:《鲁西北抗日文化教育工作片断》,本书编写组编:《光岳春秋(下)》,第289页。

③湖南调查局编印,劳柏林校点:《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湖湘文库》甲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8页。

④束为:《编印识字课本交公粮》,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编:《汾晋遗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⑤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编:《福建革命根据地文学史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76页。

⑥姜存松:《怎样编写战时民众读物》,《社教通讯(杭州)》1939年第6期,第18页。

⑦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www.kongfz.cn/8019089),2024年6月20日访问。

⑧刘大明:《记太行山华北书店》,仲秋元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15页。

言,若板材良好、保存得当,使用极限可达万次^①。正因如此,有的机构虽然也具备少量的铅印或石印设备,如太岳新华书店、延安韬奋书店,但对于受众广、需求大的识字教材和初级课本,印刷时仍选择雕版。同时,由于初级教育课本不适合长篇大论,所以字数较少;加之农村根据地分散,各个片区的读者数量不多,书籍需求有限。如此一来,机器印刷的高效优势无法充分发挥,雕版速度慢的短板也不再明显。据石祥统计,刻工每日刻制中上水准匠体字的速度一般为110字^②,那么不计算插图,一位工人十日内就能刊刻千字左右的识字课本,这基本可以满足根据地的教学需要。

5. 调整印刷与发行方法

根据地刻书业的发展,离不开印刷工作者的积极探索。如应对敌人袭扰的问题,晋察冀边区教育出版社采取“巡回印刷”法:“将刻好了的课本木板用驮骡分运各地,在纸厂附近印刷,印够一定数量之后,又整理木板,驮往别处去印,对各地解决课本问题帮助很大。”^③再如冀西三专区和冀中游击区设立地下印刷厂,“在地洞里用油印或木刻印刷课本”^④。发行方面,店员和书贩肩挑背负,主动为群众送去精神食粮。如潞城文化合作社在农忙时,“抽调两个营业员,按学区担上书担子,下乡到各小学、各村庄送书籍文具”^⑤。

二、红色雕版印刷机构

中共领导下的各类出版机构刊刻了大量红色读物,有的机构专营雕版;有些初期使用雕版,待资金充裕、环境平稳后,改用新式印刷;有些则

①何朝晖:《试论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及相关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25—27页。

②石祥:《“出字”:刻书业的生产速度及其生产组织形式》,《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105页。

③刘松涛:《华北抗日根据地用革命办法办学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第4卷(1951年)第2期,第30页。

④刘松涛:《晋察冀的反奴化教育斗争》,《北方文化》第2卷(1946年)第1期,第9页。

⑤汝文:《潞城群众翻身文化要求提高,成立新型文化合作社》,《新华日报(太行)》1946年5月3日,第4版。

是转移途中条件困难,暂时借用雕版;还有机构并用铅印、石印和雕版。

(一)政府

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机器印刷设备较为齐全,因而使用雕版印刷的情况较少。如1931年中央印刷厂成立于瑞金叶坪镇,下设铅印、石印、刻字等8个部门。其中,刻字部主要负责报头、插画之类,主任潘子仁能写能刻一手好字^①。也曾刻印少量书籍,“印刷机不够,就用油印、石印和木板印刷,在瑞金曾用雕刻木板刷印了一批《共产党宣言》”^②。1933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印刷所,以石印为主,也兼用雕版^③。1934年7月29日,江西省教育部总结会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各县、区、乡教育机关要注意搜集编审人才,印刷器具(石印、木印)和工人,迅速的送到中央教育部。”^④中央苏区的兴国县和万载县政府曾刊刻《工农兵三字经》等书^⑤,1930年,宁都县苏维埃政府刊刻《工作章程》^⑥;位于长汀的闽西印务处翻刻《社会主义浅说》,现藏于古田会议纪念馆^⑦。但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政府机关几乎没有刊刻书籍的记载。

至于地方政府,1928年初,海南的琼崖特委在乐会四区(今琼海市内)开办印刷厂,“有木板印刷和石版印刷”^⑧。1930年8月,湘鄂赣苏区的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在嘉义镇周坊村建立木梓印刷局^⑨,“以刻版印刷政府布告,各种学习、宣传资料和识字课本等”^⑩。1931年,鄂东南道委书

①朱先林、钟明星:《回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印刷厂》,《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70—371页。

②柳毅编著:《中国的印刷术》,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

③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第65页。

④《江西省教育工作计划大纲》,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⑤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写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兵三字经选》,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14页。

⑥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974页。

⑦2021年3月16日福建省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龙岩市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http://wwj.wlt.fujian.gov.cn/zwgk/tzgg/gztz/202103/t20210317_5550913.htm),2024年6月20日访问。

⑧黎雄峰等:《海南经济史》,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⑨岳阳市文化局编印:《岳阳地区苏维埃时期文化史料汇编·大事记》,1996年,第13页。

⑩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编:《中国革命老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132页。

记吴致民在湖北大冶创办印刷厂,曾刊刻《共产主义 ABC》^①。同年,湖南酃县(今炎陵县)苏维埃政府在石洲设立印刷局,“购制钢板、油印机和木刻印版设备”^②。本年底,黄端喜调任赣东北省苏石印机关主任,除负责石印业务外,还刊刻列宁小学课本及各种布告、公债券等^③。1932年底,赣东北省扩改为闽浙赣省,省苏文化部刻印局曾雕印《工农读本》,卷末版权页标明编辑、审查、印刷、发行和寄售处等信息^④。皖西苏区出版的小学教材,“均用本地出产的毛边纸,石印或木版印刷”^⑤。1933年12月6日,《红军》报道川陕苏区:“铅印、石印、木刻三个印刷局规模甚大,不日即可开工,大大印刷各种书籍、报纸、宣传品等。”^⑥今四川博物馆藏有1934年川陕省委宣传部所刻《革命三字经》和《宪法大纲》,卷末皆题“写工蒋道德,刻工杨安清”^⑦。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山东根据地滨海专署为解决教材不足的问题,“扩大了滨海印刷厂,建立了木刻部”^⑧。同年,冀鲁豫第三专署在朝北(今属山东莘县)设立印刷厂,“有木刻印刷,也有少量的石印设备……著名画家田辛甫也曾在那里工作过”^⑨。1943年秋,鲁中行署在沂蒙山根据地组建印刷厂,自编教材,刻板印刷^⑩。再如楼适夷任浙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时,主持编印教科书,

①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新闻出版(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②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著:《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县委机构——中国共产党酃县县委》,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第128页。

③闽浙赣湘鄂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印:《闽浙赣湘鄂苏区革命文化纪事·人物录》,1997年,第320页。

④《工农读本》,张孳、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下册,第762页。

⑤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756页。

⑥《苏区印刷事业大发展》,四川省档案馆编:《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75页。

⑦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印:《川陕苏区教育史文献资料选编》,1985年,第128页。母学勇:《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四川文物》1991年第4期,第43页。

⑧崔介:《拾遗集·滨海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教建设》,胜利油田党委,1994年,第309页。

⑨朱惠然:《抗战时期的教育工作》,《血火春秋——冠县革命史料选编》,第393页。

⑩魏然森:《乐群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没法制照相版,用木刻”^①。

此外,晋西北行政公署(1943年更名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山西沁源县政府文教科、晋冀鲁豫边区第二专署、太岳第二专署文教科等也曾刊刻红色读物(见文末附表1、表2)。

(二)出版社

中共领导下的出版社,多数具备机器印刷的条件,但设备数量有限,有时仍需雕版进行补充。如1938年成立于山西长治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②,至1939年已拥有七八台石印机,但也利用雕版,“石印和木刻工人共发展到二十多人”^③。再如1940年6月,赵树理调往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期间编撰通俗读物《抗日三字经》和《抗日千字文》,“木版刻字印刷,销路很广”^④。此书的印板至今保存在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⑤。延安韬奋书店以铅印、石印为主,但1944年冬因敌人封锁、物资短缺,临时用木板刊刻《绘图新三字经》。此书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画是木刻家古元同志刻的,文字是徐律同志写的毛笔字体”^⑥;在陕甘宁边区流传甚广,“曾不断印刷过好几版,印数有几万册”^⑦,其刻板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45年春,苏皖边区二专区组建淮北路西教育出版社,

①楼适夷:《抗日时期四明根据地文教战线工作》,《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上册,1992年,第346页。

②1939年日寇组织六路围攻,出版社撤出长治,大部分职员随中共太南地委在平顺、壶关一带活动,待战局稳定后,总社改驻武乡县(详参孙玉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战时读本〉出版的历史价值》,《出版史研究》第3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③杜毓沅、赵文敏:《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情况回忆》,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第296页。

④华山(杨华宁):《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瞭望》1982年第11期,第43页。

⑤山西省文物局2021年1月公布的《山西省第一批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http://wwj.shanxi.gov.cn/zwgk/tzgg_31117/qtgg/202210/t20221008_7229059.shtml),2024年6月20日访问。

⑥李文:《到革命根据地去——记华北书店、韬奋书店》,仲秋元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上册,第507页。

⑦李文口述,周永珍整理:《关于延安韬奋书店出版毕珩著〈绘图新三字经〉的资料》,转引自李频:《〈绘图新三字经〉出版价值探微》,《印刷文化》2022年第1期,第71页。

动员地方上擅长刻字和印刷的工人,“每次约印二百份,只能印些小学低年级字体比较大的课本”^①。1945年晋绥分局号召机关干部参加大生产运动,于是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们编印扫盲课本《看图识字》,“墨水是用松烟、水胶配成的,刷子等用具是自制的,裁纸刀则是从印刷厂借来的,又用木箱和木板搭了个印刷台”^②。再如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刊书颇多,且不乏理论、文学类书籍,曾汇刻《文艺丛刊》《新民主丛书》等,可惜仅存零种,其所刻《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论》《鹰之歌》现藏于国图。1943年秋,该社合并到冀鲁豫书店。据张心厚回忆:“有一批同志分来我们二所……大部分作装订和木刷工作……(1944年)将木刷、装订组建了一个单独的所。”^③此外,太岳新华书店^④、太行晋豫书店^⑤、太行书店、冀南大众书店^⑥、大众文化社^⑦、晋察冀边区教育出版社等也曾使用雕版印刷。

(三)民间书店及印刷所

私营的雕版作坊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主动开放版权,引导他们印刷红色书籍。如福建长汀下辖的四堡乡(今属连城),曾是清代重要的坊刻中心。土地革命时期,长汀是福建省

①王力生:《淮北路西教育出版社》,《永城文史资料》1990年第4辑,第63页。

②马烽:《马烽文集》第7卷《扎根吕梁山》,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

③张心厚:《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铅印厂的创建和发展》,《冀鲁豫日报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6—327页。

④太岳书店,1941年成立于沁源。1944年,与太岳日报社合并,改名为太岳新华书店(齐峰、李雪枫:《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第202页)。

⑤董清江《晋豫书店》记载:“1946年9月,国民党占领焦作……一部分教员补充部队,剩余教员无事可做,生活费也很困难……太行第四专署教育科帮助他们在附城镇成立了晋豫书店。”(梁小岑编:《太行太岳边区文艺史料选编(河南部分)》,河南省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室,2000年,第254页)

⑥原为石生贵创办的私人书店,1945年被冀南行署收归国有,改名为大众书店,搬迁到姚家庄,不久又移至武城河西山西会馆。尽管后来增加了石印和铅印,但书籍方面仍以雕版印刷为主。木印主要印制课本,石印、铅印主要印制布告、宣传品、表格及其他用品。1947年底,该店改名为新华书店(石子静:《枣南木版印刷情况》,《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1990年第5辑,第34页)。

⑦《和顺县志》记载:“1946年4月,县大众文化社成立,经营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书籍、杂志,并组织木刻工匠,雕板印刷发行小学识字课本。1949年大众文化社更名为大众书店。”(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468页)

政府所在地,当地印刷所“对一些较为固定、印数较多的宣传品,他们就用木刻板代替铅印板印刷”^①。再如1944年春,枣南(今属枣强)四区的石生贵、姚登奎创办私人书店,招收刻版、印刷、装订工人20余名,从枣南教育科领取小学课本进行翻刻,“由于当时课本短缺急需,工人们一天要工作十一、二个小时”^②。

有的书坊在文字、插图和版式等方面精益求精。如晋城光明书店,1947年8月翻刻《初级新课本》,自行设计封面,图案精美,朱墨套印。书前的《说明》详述编纂体例,首则云:“本店搜集太行、太岳两区小学课本多种,比较参考,做了一些校订增注工作(为此曾邀请了晋城城关区几十位小学教师,几次座谈)。”次则云:“本店特请民间艺术专家精心绘画,改正旧图缺点,增加儿童念书兴趣。”同时,该店具有较强的广告意识,封底的《启事》语言通俗:“因为很合各小学使用,还没有出版,就有些知道了,前来预定……如果要买,请早些来预定为盼。”^③1947年《人民日报》曾对此进行报道:“晋南新解放区教师们都说:这书对我们的文化政治帮助实在大。”^④晋城南门内的鲁迅书店曾翻刻《战时新课本》,为了减少书本磨损、延长使用寿命,便将内容较多的第四册分为两册装订。版权页印有《启》曰:“第四册原版字体太小,特将字体和篇幅同时放大,增多页数。又为书本用久,不致损坏。故分为第四册(上),与第四册(下),以便阅读。”^⑤再如冀中八专区的大众书局,“听到反映字迹不清、插图不正后,即把已刻成的板另行重刻”^⑥。此外,新文化书店、晋生书局、文明斋书局等十余家书坊都曾刊刻红色书籍(见文末附表1)。

(四)社会团体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根据地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下简

①王大同、徐恭生:《长汀印刷工人对土地革命和苏区建设的贡献》,《印刷职工运动资料》1986年第3辑,第110页。

②石子静:《枣南木版印刷情况》,《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1990年第5辑,第34页。

③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book.kongfz.com/0/3347966954),2024年6月20日访问。

④鲁生:《晋城民办光明书店,出版课本两万余册》,《人民日报》1947年11月12日,第2版。

⑤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www.kongfz.cn/56892964),2024年6月20日访问。

⑥《冀中八专区印刷业讨论发展印刷事业》,《晋察冀日报》1945年12月19日,第3版。

称“文救会”)。其中,有的文救会使用雕版印刷,配合教育系统为学校提供课本;有的则面向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刊印理论著作。如1940年冀南文救总会建立印刷厂,早期只有两架石印机,仍以雕版为主,印刷语文课本供各村小学使用^①,“贺殿卿管理木版刻字、印刷,有二十多台北印床子”^②。再如1942年鲁西北文救会在朝北县石固等村,“印出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给在乡知识分子和乡绅学究阅读……还编印出版了木刻版本的抗日冬学课本、民众识字课本等教材”^③。此外,许多地区还成立各类工人组织,如1941年,在煤铁生产集中的襄垣、武乡、左权等地设立矿业工会^④,并开设训练班,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和业务能力;有时会雕版印刷教材,现存其编印的《矿工识字课本》,大字写刻,刊印精良^⑤。

(五)合作社

合作社是劳动群众自愿联合起来进行生产、经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共产党重视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在根据地积极推进合作化运动。其中,明确记载刻书的合作社有:中央苏区胜利县平安寨工人印刷合作社^⑥,位于兴国县背街的石印刊刷合作社^⑦,1945年在山东胶东成立的平西县文化合作社^⑧,山西的潞城、屯留^⑨、平顺^⑩文化合作社。其中,潞城文化

①赵鼎新:《关于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国总会的情况》,刘艺亭、宋复光编:《冀南文学作品选》,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11页。

②张会清:《“冀南文总”出版工作片断》,《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1990年第7辑,第56页。

③丹彤:《鲁西北抗日文化教育工作片断》,《光岳春秋》,第289—290页。

④详参林里:《太行工人运动史略》,山西省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室,1986年,第36页。

⑤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www.kongfz.cn/14356028),2024年6月20日访问。

⑥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第68页。

⑦见于国图藏《共产儿童读本》第2册(索书号:sc10991)的封底牌记。封底还印有:“1932年7月15日再版,定价单册小洋7分。”国图著录为“石印翻印本”,实际为雕版覆刻本,水墨印色,有断版,字体笔画棱角分明。其插图与福建的石印原版略有不同,将许多墨色填充的地方改刻成线条状阴影。

⑧《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文化道路的文教展览馆》,《新华日报(太行)》1945年4月15日,第6版。

⑨墨遗萍:《乡村文化合作社的道路——记屯留文化合作社发展情形》,《新华日报(太岳)》1947年5月25日,第4版。

⑩龙之庆:《发展中的平顺文化社》,《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第2版。

合作社刻书最多、影响最大,被《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多次报道。它由教师、学生、知识分子及各种艺人集资筹办,“聘请了八个刻字工人,设立起小型印刷厂,翻印小学课本,使潞城新区各小学校立刻得到两万七千册木刻课本”;除本县外,还供给邻县襄垣和黎城八千册课本^①。而且该社主动解决农民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新增实物换书的方法,“发动群众积麻头、编草帽,以货交换,既增加了群众生产,又解决了自己纸厂、草帽庄的原料问题”^②。

根据笔者的调查,晋东南是刊刻红色书籍最多的地区;同时,山西从事雕版印刷的三个合作社县域相接,皆属长治市。这与当地的刻书历史不无关系。平阳曾是辽、金及蒙元早期的刻书中心^③,潞州紧邻平阳府,故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刻工流徙与书业互动。如刻于解州天宁寺的《赵城金藏》,发起人便是潞州的崔法珍,潞城、长子、襄垣等县的民众均有捐款^④。至清末民国,长治各县皆存在刻书业,以潞城和屯留为最,所刻书籍以善书为主^⑤。其中,潞城的刻书集中于同善堂(一名同善书局)^⑥,且多部书籍为邻县村民集资刊印,如1926年刻《经论合解》^⑦,卷末附平顺、潞城、长治、壶关、武乡和洪洞等县的募捐姓氏。可见潞城是长治地区的刻书中心,培养了一批刻工,这也成为日后根据地刻书的重要基础。

(六)学校

根据地的课本荒比较严重,有的学校便自力更生、翻刻教材。如吴运

①汝文:《潞城群众翻身后勤文化要求提高,成立新型文化合作社》,《新华日报(太行)》1946年5月3日,第4版。

②常江河:《为群众文化事业服务,潞城文化合作社立功》,《人民日报》1947年3月16日,第2版。

③辛德勇:《山西与中国古代的出版印刷》,《普陀学刊》2021年第1期,第263—269页。

④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⑤据笔者统计,自清光绪朝至抗战爆发,潞城刻书20种,最晚者为1935年所刻《灶王经》;屯留刻书10种,最晚者为1917年北乡西原村刻《改过积德》。

⑥同善堂起初为佛教组织创办,民国初年县人舒瑾接手,亦称“同善书局”,设于潞城舒家圪廊。1938年日军侵占潞城后,书局歇业(山西省潞城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潞城市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734页)。

⑦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www.kongfz.cn/64379310),2024年6月20日访问。

铎在安源工会创办的第三子弟学校读书时,使用的课本“是木版手工印刷的,字很大”^①。中共党员林泗斋(1937年曾任浙江黄岩县委书记)担任黄岩县茅畲小学校长期间,组织学生开办小农场、小印刷厂,“学生的作业本、课外补充读物及农民的夜校课本,都是自行雕板印刷”^②。1944年枣南抗日政府在三义庙完小创办印刷机构,由数百名教师集资,党员夏森廷负责领导,“以学生劳动为主,聘请了木刻、装订两名技师……学生中有20个年龄较大的为练习生,折页时,除一年级学生外都参加”^③。1945年,在两个半月内印刷冬学课本三万多册。1946年,学校印刷部改组为新时代书店,移至枣强县城内,并在衡水西关和景县城内设有分店^④。1945年,河南安阳第一完小“自刻木板,用麻纸印刷。所印课本不仅自用,而且还供应全县各校使用”^⑤。

三、红色刻本的分类及其版本形式

(一)书籍分类

雕版印刷的红色书籍,大约可分为教材、政治、文学、体育、生理学、日用类书、民歌唱本七类(见文末附表1)。其中,教材无论在种类还是版本数量上皆居首位,凡44种,约占总体的3/4;版本多达78种,占比超过4/5。1933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在谈论苏区的出版事业时,批评印刷厂过于重视工作文件和理论书籍,导致扫盲课本不得已采用雕版印制:“有千百万的成年、青年、儿童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课本,却被拒绝印刷,我们在那里用木刻字印刷。”^⑥同时,刊刻的教材又分为识字、国语常识合编、国语、常识、政治、数学、自然等类,其中,识字课本和国语常识合编较多,其版本数量各占1/3。这是因为初级国语和常识属于核心课程,是

①吴运铎:《安源儿童团给我革命的启蒙教育》,《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10辑,第67页。

②美溪整理:《深山里的一所小学——茅畲小学》,《黄岩文史资料》1987年第9期,第107页。

③步进:《记枣强新时代书店》,《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1990年第7辑,第53页。

④《冬学识字课本》第1册封底牌记。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book.kongfz.com/591/6010194256>),2024年6月20日访问。

⑤《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阳县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第788页。

⑥凯丰:《我们的奢侈与我们的吝啬:关于苏维埃的出版事业的管理》,《斗争》1933年第36期,第16页。

“根据地拥有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作为普及教育实施课程的重要载体”^①。识字课本一般篇幅简短,语句对仗押韵,有时还利用《三字经》《千字文》或杂字书等传统形式。1933年6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针对识字班的工作提出:“初学字的人,往往读有的韵脚的小调,容易记住。”^②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纂的《初级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最为畅销,现存至少17种翻刻本^③。刊刻数量位居第二的政治读物只有7种,革命文学、日用类书以及自然、生理知识等书籍,每类仅一两种,与教科书相差甚远。此外,根据地政府还利用民歌进行文化宣传:“这些集子大都是用木刻小唱本的形式,有的则编为识字课本,通过歌谣来学文化。”^④如1941年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邓子恢在《施政工作总报告》中提出:“改良旧剧、小调、大鼓,提倡木刻图书,利用旧形式,改进新内容,使之大众化、民族化。”^⑤安徽省博物馆藏有12种苏区民歌集,包括“油印、木刻、石印和手抄”^⑥。

(二)刊刻方式与版本特征

根据地刊刻的红色书籍,仅有少数属于自编自印,例如上文提及的《绘图新三字经》《看图识字》《战时读本》。这是因为有权限且有能力编纂教材的政府驻地,一般具备新式印刷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翻

①石鸥:《弦诵之声: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使命》,湖南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33页。

②教育人民委员部:《识字班工作》,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下册,第587页。

③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初级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有两种,分别题曾頔和皇甫束玉编著,但内容几乎一致。皇甫束玉本还曾于1948年前后进行修订(石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对于缺少出版信息的翻刻本,笔者依据封面图案、字体和版式等区分不同版本。

④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574页。

⑤邓子恢:《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报告》,本书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⑥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文物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661页。

刻本^①(见文末附表1)。其底本来源除了书籍,也包括报刊。如国图藏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刻本《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国图藏,索书号:sc00040),卷末识语云:“本文载于《新华日报》华北版,系改自口语广播。”该社所刻铁弦翻译的高尔基《鹰之歌》(国图藏,索书号:sc06495),原载《中苏文化杂志》1940年第5期。翻刻本的大量出现,主要因为根据地印刷能力欠缺,加之交通不便,难以集中刷印后分发到各地。早在1930年8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减少文盲运动》就提到:“编富有阶级性而适合工农用的看图识字样本,发给各区苏、由区苏翻印。”^②1941年秋,中共北方局在开展冬学的公开信中倡议道:“文化课教材可由各专署以上的政府编制,各县可用木刻或油印翻印。”^③1943年晋察冀第二专署石印的《常识课本》、1947年冀中大众书局石印的《初级常识课本》等书的版权页上,还印有“欢迎翻印”^④的字样。1948年,山西临汾“为了适应各地小学之急需,特先发各课样本……各分区均已开始用木刻版或石印翻印”^⑤。各地翻刻时会对原书的内容和版式进行部分改编,如太岳三专署翻刻辛安亭的《绘图老百姓日用杂字》,封面和扉页题名改为“绘图民众识字课本”,卷端题名将“日用杂字”改为“识字课本”;下栏正文与原书相同,上栏插图则重新绘制,并将配图的提问统一移至卷末^⑥。有的机构为了降低刻版难度或者缩减工本,于是省略插图和注释等内容^⑦。此外,还存在雕版与新式印刷结合的现象,例如报纸的报头、书刊的插图及封面等为木印,正文部分则用铅印,“只要以一块与

①关于雕版翻刻石印本、铅印本的鉴别,详参孙云霄:《近代石印、铅印书籍之雕版翻印本考述》,《文献》2023年第5期,第46—55页。

②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编:《福建革命根据地文学史料》,第99页。

③中共北方局宣传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冬学的公开信》,《晋察冀日报》1941年10月17日,第1版。

④分别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book.kongfz.com/141326/1118441372, https://www.kongfz.cn/14422385),2024年6月20日访问。

⑤邦俊:《一百六十万册小学课本正在各分区积极翻印中》,《临汾人民报》1948年11月23日,第1版。

⑥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www.kongfz.cn/7408036),2024年6月20日访问。

⑦太岳新育印刷厂翻刻的《初级新课本》缺少原书插图。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book.kongfz.com/279790/5906755455),2024年6月20日访问。

铅字一样厚度的木板刻木刻,就可以直接拼版上机印刷”^①。再如冀东顺义县新华书店的《初小常识课本》,正文为石印,卷首的《编辑大意》却是雕版印刷^②。这大概因为此套课本共8册,每册都要印《编辑大意》,故而选择雕版,看重其重复使用性。

从版本形式看,雕版印刷的红色课本大多具备以下特征:其一,字号较大;其二,字体为软体字;其三,配有插图;其四,字数较少,版面舒朗。这主要与其阅读对象有关,便于初学者理解。红色刻本的整体质量较高,很少出现书版漫漶、字画难辨的情形,有些图文俱佳,绣梓精工。如杜中介绍川陕根据地所刻《宪法大纲》:“古宋体字,书写恭正,刻工细腻,毛边纸,用水墨印制,字迹清晰,实属木刻印刷之精品。”^③李吉珊回忆1943年济宁金乡从太行区运来的识字课本:“字体是木刻、阳文、楷书。印刷和装订上,在当时是较为精细美观。”^④同时,插图的水平不断提高。1942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联合太北区党委邀请文化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指出:“个别木刻工作者不愿意为小学教科书刻插画,说那是刻字匠的事情,说艺术不能作婢女。”^⑤之后,古元、赵力克、田辛甫、邹雅等版画家踊跃参与课本插图的绘制。不过,有的书坊由于缺少编辑人才,翻刻时依样画葫芦,其校勘质量难以保障。如1948年郭炳林在山西襄陵贾村工作时,发现学校使用的益民书局翻刻本《国语常识合编》有多处讹误:“是木刻的,普通麻纸印的……各地县政府应即负责进行检查:错处太多的,或过于模糊不清的,可停止出卖,错处较少的应修正后再出卖。”^⑥

有些红色刻本在墨色、版式等方面与传统雕版印本不同,例如《初级

①郭召明、李晓林:《石版画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7页。

②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book.kongfz.com/1095/5429194038),2024年6月20日访问。

③杜中:《川陕根据地的印刷事业》,洪荣华等编:《红色号角——川陕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

④李吉珊:《金乡老解放区成人教育基本概况》,《济宁文史资料》1992年第9辑,第101页。

⑤杨献珍:《数一数我们的家当》,《华北文化》1942年第2期,第10页。

⑥郭炳林:《翻印小学课本应经过县级以上政府审查》,《临汾人民报》1948年12月25日,第4版。

新课本》、1941年晋西北行署印《冬学识字课本》，其字迹有明显的凹凸感，所以不是石印。有些字的笔划交叉，亦非铅印；且字体多为楷体，而根据地条件艰苦，没有财力铸造大量艺术字。因此，上述课本应是雕版，但其墨色均匀、浓厚，正反双面刷印，没有采用筒子页。这或许缘于纸墨是土法自制，纸质厚且粗糙，倘若使用棕刷刷印，可能效果不佳。所以只能加大力度拓印或者用机器压印，导致没有似水墨印刷般呈现出“墨色堆积的不同厚度”^①。这在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印刷《看图识字》的记录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本地产的马兰纸过于粗糙，每拓一幅都要用很大气力。印数太多，木板裂纹要用钉子铆住。”^②

此外，还存在雕版印刷的伪装书现象。虽然学界已有较多关于伪装本书刊的研究成果^③，但从版本上看，他们关注的是铅印、石印或油印本，并未涉及木刻本。例如1944年冀中五专区编刊的一本伪装的《四言杂字》，“用木板印刷，线绳装订，纸张颜色看来和平常小书摊上的《四书》、旧杂字本一一模样，但除了前面两三百页外，里面尽是一些有关抗日的內容”^④。此外，笔者还发现了两种伪装的红色刻本，分别由运西文化书店和南宫书店刊行，两书的封面均翻刻自1939年华北伪政府发行、北平新民印书馆铅印本《初小常识教科书》，其内容却是宣传抗日政策的^⑤。

四、结语

中共根据地所在的农村地区较为落后，无论古代还是近代，图书市场的规模一直很小。有些学者认为民国时期西北、华北的雕版印刷业几乎绝迹，更没有关注到其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如民国剧作家和藏书

①薛冰：《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0页。

②束为：《编印识字课本交公粮》，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编：《汾晋遗珠》，第165页。

③详参唐弢：《书刊的伪装》，《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09页；杨志伟：《中国共产党伪装书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第19—28页；吴密：《革命文献伪装本图录题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④刘松涛：《晋察冀的反奴化教育斗争》，《北方文化》第2卷（1946年）第1期，第10页。

⑤分别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www.kongfz.cn/27348065>，<https://book.kongfz.com/591/253900402>），2024年6月20日访问。

家卢前称：“铅槧盛而雕版术日衰，世多不知刊刻为何事。三四十年来舍南北二京，惟武昌、开封、长沙、成都尚有刻手。”^①郑振铎认为：“木版雕刻术一时为之压倒，从此一蹶不振……新的有关文化、学术的书刊，都是用近代印刷术印刷的。”^②然而，在铅印和石印业的猛烈冲击下，近乎退出图书市场的雕版印刷，却能在革命根据地发挥作用。共产党关心落后群众，大力扫盲；编刻教材，书担下乡；因时制宜，就地取材；开放版权，允许翻刻。这些举措推动了农村地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同时对唤醒民族意识、鼓舞抗日斗志和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老舍曾感慨“文章下乡”之难：“因为印刷、纸张、运输种种的困难，都在这儿阻抑着这潮水的畅行，而中国又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呀！”^③根据地印刷条件简陋，出版事业筚路蓝缕，偏远地区雕版印刷红色读物，普及教育，如毛细血管般扎根基层，源源不断地为群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批红色刻本与古代刻本不同，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刻本也不同。不仅思想内容不同，出版和发行方式也不同。有些书籍是在地洞中刷印的，有些是学生和老师动手刊刻、装订的，在炮火硝烟中、在敌人的监视下，紧张地、秘密地进行着。传统印刷与革命文化相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于雕版印刷术的利用形式多种多样，除图书外，还曾刻印票据、传单、纸钞和年画等^④。其中，新兴木刻运动如火如荼，期间发明了木刻印刷机^⑤，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晋西北

①卢前：《书林别话》，叶德辉：《书林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

②郑振铎：《引言》，北京图书馆编：《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1952年，第3页。

③老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于涛编：《老舍作品精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④李宇：《晋冀鲁豫边区的契约文书》，《党史文汇》2015年第3期，第53页。张狄：《闽粤赣边区建立军民合作社发行流通券》，吴平主编：《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7页。林振荣：《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集市贸易与“南梁油布币”》，《庆阳地区金融志》，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621页。李丰祝：《党的领导和武强年画》，《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1990年第5辑，第94—96页。

⑤石天：《鲁艺美术系生活琐记》，孙新元、尚德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活动回忆录》，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91页。

木刻工厂等专门的印刷机构^①。同时,新华书店将过去师徒授受的雕版技艺付诸文字,传播开来。刻字工人裴三保在《怎样刻字》中谈到:“刻木字和木图样,首先要懂得木头的性质。”并讲述“用刀”和“上样子”的方法^②。

雕版印刷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在根据地印刷史中的地位需要重新审视。红色刻本作为见证光辉历史的革命文物,不仅要保护好,还要利用好,深入发掘其背后的故事与精神内涵。编目人员著录革命文献的版本时应着意鉴别,将木刻本、木活字本与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区别开^③。另外,根据近年各省公布的《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等资料可知,有些博物馆、纪念馆中还收藏有红色书籍和文件的木刻印板^④,需要对这类革命文物进行专门的征集、统计与整理。相信随着更多的红色刻本被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深化。

①李少言:《战斗的画笔和刻刀——晋绥边区艺术活动概况》,王一民等编:《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回忆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6页。

②厂务委员会编:《印刷技术手册》,华北新华书店第一印刷厂,1948年,第115—116页。

③如国图收藏的《工农读本》第1册(索书号:sc04234)、《国语课本》第1册(索书号:sc02974)、《初级新课本》第4册(索书号:sc05142)、《初级临时课本》(索书号:sc05153),国图编目及《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均著录为“木刻本”。实际上,《工农读本》是石印本,其余3种为铅印本。《初级小学常识课本》(索书号:sc01382)实为刻本,却被著录为石印本。再如上海图书馆藏木刻本《初级临时课本》,被误定为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编:《红色出版物总目》第18册,第75页)。另外,关于木活字本红色文献,详参孙云霄:《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图书馆杂志》2024年第7期,第12—18页。

④如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藏1934年中共中央出版的《战术与策略》所用封面印板,江西省博物馆藏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目前十大政纲》的木刻印板(见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革命文物名录第一批》, http://dct.jiangxi.gov.cn/art/2020/12/21/art_14524_3003600.html, 2024年6月20日访问)以及安徽省六安市党史办保存的《列宁小学课本》雕板(据《印刷职工运动资料》1986年第3辑插图)等。

附表 1 根据地红色刻本统计表(标注 * 者指翻刻本)

书 名	版 本
教 材	
识字课本	
《工农兵三字经》*	1. 1930 年兴国苏维埃文化部 2. 湖北仙居周家垱印刷所
《工农三字经》*	1931 年万载县苏维埃政府
《革命三字经(人人必读)》	1934 年中共川陕省委会宣传部
《抗日三字经》	1940 年华北新华日报社
《新千字文》	1939 年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
《抗日千字文》	1940 年华北新华日报社
《矿工识字课本》	1941 年襄(垣)武(乡)左(权)矿业职工会
《冬学识字课本》	1941 年晋西北行政公署
《冬学识字课本》	1944 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
《冬学识字课本》*	枣强新时代书店
《绘图新三字经》	1944 年延安韬奋书店
《看图识字》	1945 年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
《绘图老百姓日用杂字》*	1. 潞城文化合作社 2. 山西晋生工厂 3. 沁源县文教科 4. 不详(其余三种封面皆刻有出版者,此册无)
《绘图庄稼杂字》*	1. 潞城文化合作社 2. 新育书店 3. 不详(未翻刻原书插图)4. 不详
《民众识字课本》*	鲁西北文救会
《绘图民众识字课本》*	太岳三专署印刷厂
《识字课本(民众学校)》	晋冀鲁豫边区第二专员公署
《识字课本(冬学小学适用)》*	1. 1945 年太岳新华书店 2. 平西县文化合作社
《妇女识字课本(民众学校)》	1947 年大众教育社
《人民军队三字经》*	三种,不详(1947—1949 年翻刻)①

①均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www.kongfz.cn/2207377>,<https://book.kongfz.com/7285/893807043>,<https://book.kongfz.com/225981/6013711057>), 2024 年 6 月 20 日访问。

续表

书 名	版 本
国语、常识合编	
《共产儿童读本(列宁小学)》*	1932 年兴国县石印刊刷合作社
《红孩儿读本(初级小学)》	平江第九区工农苏维埃
《工农读本》	1932 年闽浙赣省苏文化部刻印局
《战时新课本(初级小学适用)》*	1. 1945 年太行晋生书局 2. 1945 年晋城新文化书店 3. 晋城鲁迅书店 4. 1943 年刻本(底本为华北书店本)
《初级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	1. 晋城光明书店 2. 潞城文化合作社 3. 太岳新育印刷厂 4. 太行书店 5. 太岳新华书店 6. 冀县书店 7. □□教育社 8. 益民书店 9. 民众书店 10. 晋城鲁迅书店 11. 太岳鲁迅书店 12. 太行晋豫书店 13. 不详(多色印) 14. 平顺县文化教育社 15. 长治解放印刷厂 16. 冀鲁豫书店 17. 邢台利华印刷厂
《初级临时课本》*	不详(据《红色出版物总目》第 18 册第 75 页)
不详(第 21 课为“共产党”)	不详(内容、版式均不同于已知书籍)①
国语课本	
《农民讲话》	1932 年湘赣省苏维埃文化部
《国语读本》	不详(据《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 2 卷第 1004 页)
《初级国防国语课本》*	1. 1943 年牟平育新印书馆 2. 不详
《初级小学国语课本》*	1945 年冀南大众书店
《国语课本(小学校初级用)》*	山西运城稷山县益民书店
《国语读本(初小自修适用)》*	枣强新时代书店
《初小国语读本》*	南宫书店
《初级国语(国语课本)》*	1. 写刻本 2. 宋体字刻本(1948 年晋绥边区教育处编)
《国语课本(初级)》*	1949 年赵城苗范五文明斋书局

①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book.kongfz.com/0/210896825>),2024 年 6 月 20 日访问。

续表

书 名	版 本
《冬学文化课》	太岳第二专署文教科编印
常识课本	
《国防常识课本(初级)》*	不详(底本为胶东海阳印刷社石印本)①
《初级国防常识课本》*	1943 年翻刻修正本(胶东国防教材编辑委员会编)
《初级小学常识课本》*	1. 1943 年新记印刷厂 2. 1945 年晋生工厂
《初级小学常识课本》*	1. 冀南大众书店 2. 南宫书店 3. 1945 年运西文化书店
政治课本	
《战时读本》	1939 年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
《冬学政治课本》	1945 年六专署编审,大众书店监印
《抗日冬学课本》	1943 年鲁西北文救会
数学课本	
《高级小学算术课本》*	1943 年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
自然课本	
《高级小学自然课本》*	1943 年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
政 治	
《共产主义 ABC》*	1931 年湖北大冶县苏维埃印刷厂
《宁都县苏维埃工作章程》	1930 年宁都县苏维埃政府
《社会主义浅说》*	1930 年闽西印务处
《宪法大纲》*	1934 年川陕省委
《共产党宣言》*	瑞金中央印刷厂(1931—1934)
《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附《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	1942 年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新民主丛书》之一)
《新民主主义论》*	1. 1942 年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 2. 鲁西北文救会
《论持久战》*	1942 年鲁西北文救会

①见于“孔夫子旧书网”(<https://book.kongfz.com/0/6125262141>),2024 年 6 月 20 日访问。

续表

书 名	版 本
日用类书	
《绘图日常应用文》	1943 年木刻石印印刷厂(华北书店、新华书店合办)
《新编革命对联大全》	不详(国图藏,索书号:sc04217)
文 学	
《鹰之歌》附《海燕》*	1942 年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文艺丛刊》之一)
体 育	
各种赤色体育规则*	1934 年(据《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第 203 页)
生理学	
《解剖生理大意》*	1933 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

附表 2 红色雕版印刷机构及其分布

	根据地(解放区)	省	出版地点	刊刻机构
土地革命时期	中央苏区	福建	长汀	印刷所
		江西	瑞金	中央印刷厂、教育部印刷所
			兴国	县苏维埃政府、石印刊刷合作社
			胜利(今属于都)	平安寨工人印刷合作社
	湘赣苏区	江西	永新	湘赣省苏维埃文化部
	湘鄂赣苏区	江西	万载	县苏维埃政府
		湖南	平江	木梓局
			酃县(今炎陵)	苏维埃文化印刷局
		湖北	大冶	苏维埃政府
	赣东北苏区	江西	横峰	省苏文化委员会刻印局
			安源	工会俱乐部
	鄂豫皖苏区	湖北	黄安(今红安县)	仙居周家塆印刷所
	川陕苏区	四川	巴中、达州一带	木印印刷局
	琼崖根据地	海南	乐会(今属琼海)	印字厂

续表

	根据地(解放区)	省	出版地点	刊刻机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	陕西	延安	华北书店(后改为韬奋书店)
	山东滨海专区	山东	莒南	滨海印刷厂木刻股
	山东鲁中区		沂水	沂蒙印刷厂
	山东胶东行政区		平西(今属平度)	平西县文化合作社
			牟平	育新印书馆
	晋冀鲁豫边区 冀鲁豫区		山东	朝北(今属莘县)
		寿张		运西文化书店
		河南	内黄	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
			范县	冀鲁豫书店
			安阳	安阳县第一完全小学校
	晋冀鲁豫边区 冀南区	河北	枣南(今属枣强)	三义庙完小(后改为新时代书店)
			枣南(后至武城)	大众书店
			南宫	冀南文救总会、南宫书店
			邢台	利华印刷厂
			冀县(今冀州区)	冀县书店
	晋冀鲁豫边区 太行区	河北	涉县	太行书店
		山西	和顺	大众文化社
			长治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后至武乡) 解放印刷厂
			武乡	华北新华日报社
			平顺	平顺文化教育社
			潞城	潞城文化合作社
			榆社	第二专署
			陵川	晋豫书店
			不详	襄(垣)武(乡)左(权)矿业职工会
			不详	大众教育社、晋生书局(晋生工厂)

续表

	根据地(解放区)	省	出版地点	刊刻机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晋冀鲁豫边区 太岳区	山西	沁源	县政府文教科
			屯留	屯留文化合作社
			士敏	太岳第二专署文教科
			闻喜	太岳三专署印刷厂
			晋城	光明书店、鲁迅书店、新文化书店
			赵城	文明斋书局
			不详	太岳新育书店(新育印刷厂)
	晋察冀边区冀中区	河北	交河	大众书局
	晋察冀边区北岳区	山西	平山	晋察冀边区教育出版社
	晋察冀边区冀晋区		繁峙、灵丘一带	五专署
	晋绥边区	山西	兴县	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边区行政公署)
			稷山	益民书店
	苏皖边区	河南	永城	淮北路西教育出版社
	浙南根据地	浙江	黄岩	茅畚小学
	浙东行政公署		余姚	教科书编辑处

【作者简介】孙云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明清书籍史。

